

◎ 田学军 著

交际镜像中的

语言、文化、语用



交际镜像中的 语言、文化、语用

田学军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和桥梁,是实现语用的先决条件;文化是语言和语用的母体和土壤;语用是通过玩味语言实现(策略)社会交往的途径和归宿。语言、文化和语用三者之间彼此辅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本书收录的论文折射了近几年来作者对语言、文化和语用等问题的反思。语言探讨方面的文章是作者在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语用学方向)期间发表的学位作业;文化以及非言语信息的感悟和认识是作者在给硕士生和本科生开设相关课程的基础上写成的;隐喻探究方面的文章源于作者的专著《隐喻的语用视角研究》,是隐喻在语用方面的实例研究和具体运用,集中体现了作者对隐喻研究的现状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本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课题的研究具有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启迪心智、感悟科研方法等作用,可以作为相关领域的学生、教师和语言工作者以及潜心语言、文化和语用等课题研讨的学者的阅读书目和参考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际镜像中的语言、文化、语用/田学军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618-3311-7

I. ①交… II. ①田… III. ①文化语言学—研究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7223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网 址 www.tjup.com
印 刷 天津市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69mm×239mm
印 张 13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
定 价 24.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田学军 1963年9月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点硕士生导师;兼任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和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协助学院对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的预期目标、课程设置、实现路径、监控措施等进行了必要的勾画,在硕士生培养的高标准、制度化、科学化、人性化等方面尝试前瞻性的探索!科研兴趣包括普通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外语教学、文化比较、外语学科规划和建设等。公开发表科研作品60余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外国语类核心期刊等杂志论文46篇,论文集收录论文6篇,著作6部(2部专著(《隐喻的语用视角研究》、《交际镜像中的语言、文化、语用》),主编1部、副主编1部、参编2部),翻译2篇)。科研作品曾获山东省德州市和山东财经大学(筹)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论文《意义模式:研究现状及其新发展》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主持完成天津市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交际视阈中的批评策略及其文化特征研究》(省部级)、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意义模式及其运作机制研究》(天津市教委)以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非言语信息交际功能研究》、天津工业大学《加速课程体系建设,促进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和《研究生培养规划研究——以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为例》等项目。目前给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生讲授语言学概论、语义学、语用学、西方思想与文化、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课程;曾经给英语专业本科生讲授语言学概论、语用学导论、中西文化比较、口语、语法、教学法等课程;亦曾讲授大学英语,四级通过率(一次)曾达98%,四级最高分98.5分,六级最高分97分。2009年荣获香港桑麻基金会“教师桑麻奖”。

自序

语言是一面镜子,它能折射出一个国家及其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外交、军事以及国力盛衰等状况;能折射出一个言语社团及其性格趋向,是个体主义文化、弱语境文化、非接触文化、一元时间/单向计时制(文化)、外向型文化、积极型(民族)文化、动刚文化和离散型文化,还是集体主义文化、强语境文化、接触文化、多元时间/多向计时制(文化)、内向型文化、审慎型(民族)文化、静柔文化和聚拢型文化;能折射出单一社会个体的地域位置、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文化积淀、性别差异、语言技巧、个性喜好等诸多特征。语言的魔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每时每刻都受到语言的护佑,我们的社会生活自然也逃不脱这张无形的网。

对于文化,不同的方家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定义。但是不管怎么样来界定文化,文化应该是根植并且显现于特定群体的历史发展、国家体制、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等多种因素中,是其合力作用的结晶。在前述文化特征中,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孕育东西方文化现象的“母体”和“发动机”:东方文化因为集体主义特质才彰显出强语境文化、接触文化、多元时间/多向计时制(文化)、内向型文化、审慎型(民族)文化、静柔文化和聚拢型文化的特征,西方文化因为个体主义的闪光才凸显出弱语境文化、非接触文化、一元时间/单向计时制(文化)、外向型文化、积极型(民族)文化、动刚文化和离散型文化的靓丽。

意义是语义学和语用学共同关注的、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意义的研究因其相对独立但彼此互补的侧面(表层意义和隐含话意)成就了语言学下属的两大热门学科——语义学和语用学。语用学研究的是以交际者为主体,以语境为依托,以运用和理解语言为手段,以策略、成功地交际为目的的互动意义的建构和磋商。我们有理由认为,意义和语境是语用学的两个最稳固的基石和支柱。例如:(1)They went to a bank. (2)It is cold here. (3)He is a genius. 例(1)中的 bank 是指银行,还是指河岸?例(2)是陈述事实、发表感叹,还是请求或抱怨呢?例(3)是真诚赞扬,还是暗中讥讽?这些问题对于排斥语境和交际主体的语义学而言,是无从下手或者根本无法解决的。反之,语境一旦适时介入,此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恰是因为语境的杠杆作用,意义研究才得以顺利地由语义学切换到语用学,表层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赋予了相应的隐含话意。

语言、文化和语用三者之间彼此辅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和桥梁,是实现语用的先决条件;文化是语言运用(语言和语用)的母体和土壤;语用是通过玩味语言实现(策略)社会交往的途径和归宿。换言之,语言是文化和语用架构承载的工具,文化是语言和语用的靠背和语境,语用则是在文化的光环中依靠语言实现的传递意义的社会交际过程。

收入在本书中的 17 篇论文折射出了近几年来作者对于语言、文化、语用等问题的反思。《英语发展之哲学思考和启示——兼论语言优劣观之错误》、《“普遍语法”的哲学渊源和语言观》、《语用学的源起、繁盛和展望》、《意义推导模式评析》是作者在北京

师范大学师从周流溪教授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语用学方向)期间发表的学位作业。鉴于其中的某些方面做了必要的微调,在此就没有注明发表的具体期刊。当然,这方面的探讨涉及的因素复杂多样,切入点也因人而异。在本书中,作者对于语言的深思是从这样的考量入手的:语言现象的探讨虽然可以人为地划分为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两个视角,但是二者的界限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鲜明;恰恰相反,在对某一语言现象的探讨中,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因为语言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可以说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只有在动中求静、静中察动,才能把握住语言(现象)的本质,进而发现其内在扑朔迷离的变化特征。

《东西方文化整体特征和底蕴之对比分析》、《个体独立性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对比研究》、《非言语信息交际功能研究》、《非言语信息在课堂教学中的功能》、《非言语信息在东西方教学中不同作用的文化解读》、《批评以及策略批评探究》、《东西方批评策略的对比研究和文化解读》、《“中国”称谓的语言学解读》等文章是作者在给硕士生和本科生开设“跨文化交际”和“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方面,作者没有对某一特定文化及其现象和细节展开讨论,而是换了一个视角,用全新的思路对文化(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信息)进行再思考。尽管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形成了相异的民族个性和文化传统,但是如果把这些文化(现象)进行总体的归类并找出规律性的文化特征,对于开阔(文化)视野、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无疑是有裨益的。

《基于隐喻的策略社会交往的交际顺应理论和模式》、《隐喻的策略交往顺应理论和模式——隐喻研究的纰漏和补正》、《隐喻的外显、内隐和模糊功能》、《隐喻含意和隐喻功能的互动运作机制》、《意义模式及其运作机制——代码模式、常规含意模式和隐喻含意模式的趋同和趋异》等文章是作者在博士论文《隐喻妙笔生花——隐喻之语用视角研究》(2007年更名为《隐喻的语用视角研究》,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写作的,集中体现了作者对隐喻研究的现状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认识。隐喻是表面错配而内隐契合的有益于更有效交际的语言手段和策略,隐喻是人类(策略)交往的重要语言资源和语用策略。众所周知,在社会生活和现实交际中,符号和所指对象、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的不匹配随处可见。因为相对静止的语言实际上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也恰恰是语言的这三大特性给我们预留出了充分的玩味语言的空间,我们才得以策略地运用语言实现策略的或者更有效的交际。因此,非常规的交际策略比惯常的言语手段所产生的语境效果更加强烈,同时又承载着人们所赋予的情感或感情意义——褒扬、赞美、肯定或贬斥、鄙视、否定。当然,这种情感色彩会因语境(如预设、情感、态度)的不同而被发话人升格或降格,从而起到传情达意、感染他人的预期效果,给人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如上观点既是作者撰写本书的初衷和切入点,又是作者学业进取和科研努力的方向。鉴于书中的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不同的课题之间难免具有部分重叠的内容,在细节方面也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探讨。加之本书以理论研探为重心,某些观点必定会有偏颇之处。万望业界的专家不吝指正!

田学军
2009年6月

献给——

我的老师

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目 录

英语发展之哲学思考和启示——兼论语言优劣观之错误	(1)
“普遍语法”的哲学渊源和语言观	(9)
东西方文化整体特征和底蕴之对比分析	(16)
个体独立性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对比研究	(25)
非言语信息交际功能研究	(33)
非言语信息在课堂教学中的功能	(42)
非言语信息在东西方教学中不同作用的文化解读	(52)
批评以及策略批评探究	(59)
东西方批评策略的对比研究和文化解读	(67)
“中国”称谓的语言学解读	(74)
语用学的源起、繁盛和展望	(80)
意义推导模式评析	(87)
基于隐喻的策略社会交往的交际顺应理论和模式	(96)
隐喻的策略交往顺应理论和模式——隐喻研究的纰漏和补正	(113)
隐喻的外显、内隐和模糊功能	(135)
隐喻含意和隐喻功能的互动运作机制	(157)
意义模式及其运作机制——代码模式、常规含意模式和隐喻含意模式的趋同和趋异···	(176)

英语发展之哲学思考和启示

——兼论语言优劣观之错误

摘要:英语原是日耳曼语族的一个小语种,“出身”可谓“卑微”。在其发展进程中,它又饱受了多种磨难,有两次差点儿被消灭,如今它却发展成为一种公认的“全球性”语言。由此可见:语言无论大小、强弱,都没有优劣和贵贱之分,只要兼收并蓄、融各家之长就能强盛起来。

关键词:英语 发展 语言观 优劣 错误

一、引言

Joshua A. Fishman 认为,“English is less loved but more used; French is more loved but less used”(英语受崇爱少,但使用更广泛;法语受崇爱多,但使用相对有限)。虽然这只是 Fishman 就英语和法语进行的相对比较,但其对英语的轻视之意和对法语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看法与社会上相当通行的语言优劣观没什么两样,和人的出身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世俗观点如出一辙,危害极大。中国语言学界的学者都知道,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针对《汉字文化》实际主编徐德江的某些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某些方面就涉及语言的优劣问题。说到英语,笔者不想妄下结论,只想通过对英语发展的简略回顾,阐释清楚相应的观点。

二、英语的发展历程

(一) 英语地位:日耳曼语族的一个小语种发展成为当今公认的“全球性”语言

英语的发展和遭遇非同一般。它原是日耳曼语族的一个小语种,“出身”可谓“卑微”,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又饱受“磨难”。公元 597 年,罗马人对英国的基督教化(christenizing)使这个岛国接触了拉丁文明,自此大量的拉丁词汇进入到英语之中;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使两个民族的语言混杂在一起;诺曼征服则使英语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岁月中沦落为底层群体的主要语言,而法语则成了几乎所有场合贵族及其生活圈的必用语言。当英语再次成为英国社会各阶层使用的语言时,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词汇方面,与 1066 年的英语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同样,百年战争、中产阶级的崛起、文艺复兴、英国海洋强国地位的确立、英帝国的扩张、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达等都以其相应的方式,在相关的方面为英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期间,英语有两次差点儿被消灭,如今它却成为一种公认的“全球性”语言。

(二) 英语发展三阶段: 古英语、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

英语的发展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英语(Old English, 450—1150)、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 1150—1500)、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 1500—)。语言学家亨利·斯威特把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词形变化完整期”(period of full inflection)、“词形变化消减期”(period of leveled inflection)、“词形变化消失期”(period of lost inflection)。

英语在其 1 500 多年的发展中,由词形多变化的综合性语言逐渐演变为接近汉语和越南语的词形无变化的分析性语言。现在,英语词形的变化仅限于名词、代词和动词。在欧洲诸语言中,只有英语没有形容词词形变化,英语动词的词形变化也比较简单。这与德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英语的这些变化是其成为“国际性语言”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古英语

英国人的远祖第一次立足于不列颠这个岛上是在公元 5 世纪。早在公元前 55—公元前 54 年罗马大将凯撒就入侵了这个岛国。一个世纪之后,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在内有严重分裂、外有强敌压境的关头,罗马人于公元 406—407 年撤走了最后一批军团。不列颠最强大的敌人——日耳曼海盗:朱特人、盎格鲁人(Angles)和撒克逊人趁虚而入。其所讲语言是西日耳曼语中的三种不同却能互相听懂方言。这三种方言汇合成为古英语。由于盎格鲁人人数最多,不列颠群岛逐渐用盎格鲁称之。England(英国)来之于古英语 Engla-land(意为 land of the Angles,盎格鲁人之地);而 English(英语)(古英语拼写为 Englisc)明显是指“盎格鲁人的语言”。这一征服是漫长而曲折的,中间曾有几度较长的间歇,直到公元 7 世纪才完成。

古英语不是统一的语言,其主要方言有盎格鲁(Anglen)(包括莫西亚(Mercien)和诺森伯兰(Northambrien))、(西)撒克逊、肯特(Kentish)。由于多方面原因,(西)撒克逊方言逐渐成为一种通用的文学语言。但是,严格说来,现代英语的真正祖先是莫西亚方言,即伦敦方言。

从总体上讲,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读音、拼写、语法和词汇等方面。

从 5 世纪开始,古英语的元音就有一种由“开”向“闭”发展的趋势。从 9 世纪起,英语的辅音系统是稳定的,而元音系统一直在变动。入侵不列颠的部族没有草体字(即现在的书写体),他们所使用的是碑铭文字(亦称秘符体字母)。后来,英国人想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就跟爱尔兰僧侣学会了使用拉丁字母。对于不能用拉丁字母作标记的语音,就加上几个字母,仿佛抓住什么用什么。当时没有拼写规则,没有现代的所谓“正字法”。直到 18 世纪,即所谓的“光明世纪”,正字法才建立起来,并成为必须遵守的规范。古英语有着完整的曲折变化,如名词变格有强变格、弱变格、小变格,动词分为强动词和弱动词。古英语词尾的重要性保证了词的更大的独立性,如主语、动词和补语,依其相互关系可有六种意义、频率不同的排列法:SVC、SCV、VSC、VCS、CVS、CSV。古英语的基本词汇是西日耳曼语的共同词汇。外域对古英语词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凯尔特影响(The Celtic Influence) 如地点、河流名词 Kent, London, Thames 和

其他借词。

(2) 三次拉丁(罗马)影响(The Latin Influence) 即拉丁前期影响(Latin Influence of the Zero Period)、拉丁影响第一时期(Latin Influence of the First Period)和拉丁影响第二时期(Latin Influence of the Second Period)。欧洲大陆上的日耳曼部族在入侵不列颠之前就已经和罗马人有所接触,其语言中也就有了许多拉丁词汇,如 strata(street)、vallum(wall)等,故这些词汇被称为大陆借词(Continental Borrowing)。第一时期的拉丁词汇是通过凯尔特人传入的,据估算这样的拉丁词汇约有 600 个,但传入古英语的只有 5 个,外加地名中的某些成分,如 port(harbor town 港口城市)、Manchester 等。第二时期的借词又分为早期借词和晚期借词。早期借词多半和基督教、教会有关,且在阿尔弗雷德大帝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使用,如 angel(天使)、abbod(abbot 男修道院长)。晚期借词(公元 16 世纪以后)多半是书面语,如 paper(纸)、istoria(history 历史、叙述、故事)。第二时期的拉丁影响作用广泛,意义深远,标志着将外来词融入其词汇系统的英语习惯的开始。

(3) 斯堪的纳维亚影响(The Scandinavian Influence) 这其中包括三个阶段,787—850,850—878,878—1042。如现代英语中后缀是-y 的地名,lagu(law 法律);一些古英语的词被古诺斯语(Old Norse)(古诺斯语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代表)替代,如 byrd(birth, 出生)被 birth、descent(出身、血统)替代;进入英语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词汇不仅有名词、形容词、动词,而且有代词(如 they, their, them)、介词、副词,甚至助动词 to be 的一部分;在语法和句法方面,斯堪的纳维亚也对古英语产生了重大影响,如-s(动词现在时、肯定句第三人称单数词尾)和-ing(分词词尾)等。

2. 中古英语

中古英语是从古英语转变为早期现代英语的过渡。这期间(1066—1200)首先是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并造成英语处于从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English),随之是英语地位的恢复和再确立(the Reestablishment of English,1200—1500)。1066 年的诺曼征服改变了英语发展的方向,在这之后的 200 年,法语成为英国上层社会日常交流的语言,主要原因是在这期间英国和大陆联系紧密。在英国法庭和上层社会的交际圈中讲法语成了身份和时尚的象征,英语则退步为从属语言,只在大众(口语)的交流中使用。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没有把征服者的语言强加于英国,对英语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加之民众把学会点儿法语看做是受人尊敬的重要标志,两个民族间的通婚现象又很多,诺曼底人和英国人“就一般平民而言,简直说不出谁是英国血统,谁是诺曼底血统”。从 13 世纪开始,一些其他因素促使统治者对法语逐步疏远和脱离,英语由此进入了再确立时期。英语和大陆链接第一环断裂的标志是 1204 年约翰国王失去诺曼底。百年战争或许可以认为是对法语的致命一击。当时法语被看做是敌人的语言而遭到排斥。促使英语恢复其先前威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广大民众状况的改善、中产阶级(甚至包括工匠和商人)的崛起以及新兴城市的出现。在英国的这段发展史上,1250—1400 年被认为是英语全面取代法语的标志时期。到 14 世纪,英语再次成为英国的主要语言。1356 年伦敦市长和郡长签署命令: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地方法院的诉讼记录使用

英语,由此承认并确立了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1349年之后,英语开始在学校里使用,到1385年使用英语已成为平常的现象。英语完成其地位恢复的最后一步是书面语的使用。15世纪,英语用于乡镇和协会的卷宗以及中央政府很多部门。1423年之后,议会文献、卷宗也常常用英语书写。亨利五世(1413—1422)的统治被认为是书面英语使用的转折点和标志。中古英语经历了“大悲大喜”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和深刻,主要体现在:曲折词尾腐化(decay)、语法性别差异消失、句法(屈折转向词序)和法语词汇激增等方面。由上层社会传入英语的普通法语词汇主要涉及如下的领域:政府和管理词汇,教会词汇,法律词汇,军队和海军词汇,时尚、饮食和社交词汇,艺术、学识和医药词汇。法语对英语的影响范围包括名词、形容词、动词和短语等。1905年,Otto Jespersen对从法语借入的1000个英语词汇进行了一项统计研究,根据其在英语中首次记录的日期划分,并按半个世纪进行分组,其情况如表1所示。

表 1

年代	增长情况
被征服后 100 年	无增长
12 世纪后半期	稍有增长
1200—1250 年	速度加快,但直到 1250 年之后才真正称得上大量
14 世纪末	达到顶点,到 1400 年激增之势已经缓解
15 世纪	急速下降,之后逐渐减弱

在中古英语时期,进入英语的法语词汇的总数目是 10 000。其中的 75% 现在依然在使用。

诺曼底人征服英国为英语更快地演化创造了条件。但英语本身的结构并没有被改变,英语还是一种日耳曼语。中古英语有四种方言,即北方方言、中东部方言、中西部方言和南方方言。由于合力的作用,首都伦敦的城市方言,构成了普遍认同的英语口语和书面语之标准英语的基础。到 15 世纪后期,伦敦标准至少在书面语方面被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广泛接受。

3. 现代英语

现代英语始于 1500 年。在这一时期英国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文化运动,首先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然后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殖民主义、工业革命、帝国主义、现实主义,它们均以各自特有的方式给英语留下了印迹。可以大致进行这样的划分:第一阶段是文艺复兴(1500—1650);第二阶段是求助权威(The Appeal to Authority, 1650—1800);第三阶段是 19 世纪及之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在第一阶段,英语面临着三大问题,即地位确立、“正字法”和丰富化。古典文艺复兴运动到达英国是相当晚的。人们在学习希腊语的同时,摒弃了中世纪的拉丁语,热情地学习西塞罗(Cicero)的拉丁语。拉丁语课程从 14 世纪末起是用英语教授的。这在当时已是一大进步。至于教授英语,在那时还谈不上。虽然如此,第一批使用本族语著述的人却是提

倡研习古典语文,满脑子尽是柏拉图、弗吉尔的学者。在当时使用拉丁语比英语方便得多的情况下——因为所需术语拉丁语皆可提供——他们使用英语表达抽象概念的努力是多么值得赞赏。在经过了激烈的论辩和争论之后,许多人(如莫尔)开始用英语写作、出书。此外,为使更广泛的民众了解重新发现的古代文化珍宝,古典学者做了大量的编译工作。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翻译工作的黄金时代。从此,人们越来越多地用英语来读古典作品了。宗教改革促使英语不仅成为古代学术和艺术的表达工具,而且成为神学家的语言、礼拜祈祷的语言、宗教的语言。《钦定圣经译本》(*Authorized Version*, 1611)和“通用祈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acraments*)使英国广大民众,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学人志士,都感受到其语言之庄严宏伟。随着神学布道、著书立说频频使用英语,英语在各个领域都大获全胜。英语拼写的固定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及其在1755年出版的词典前言中的观点紧密相连。拼写是英语在16世纪开始有意识面对的问题之一。只是到了最后三十多年才有人第一次致力于正字法,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主张简单的拼法规范,这是严格地按发音拼写和随便拼写之间的妥协办法。马尔卡斯特是英语正字法的奠基人,之后英语正字法便沿着轨道快速发展,大约在1650年就固定下来了。另外,大约从1400年开始,英语发生了“元音大变化”(*The Great Vowel Shift*),直到1750年才完成。可以说从18世纪末起,英语的读音是稳定的。约翰·沃克在英语读音方面做出的贡献可与约翰逊在正字法方面做出的贡献相媲美。为了满足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英语又从其他语言借入了大量的词汇:相当一部分新词借自拉丁语,一些词汇借自希腊语,很多来自法语,一小部分来自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甚至还借了一些早期英语和地方方言词汇。这期间,除了翻译家 *Philemon Holland* 之外,在英语作家中莎士比亚的用词量是最大的,他对待借词的态度无疑是很包容的,其词汇的读音也已经非常接近当代英语。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人们渴望稳定,早期的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让步于对系统和规序的期盼。18世纪的学者们努力使英语标准化、优化并且定型。人们的注意力首先转向语法,但却发现英语根本没有语法。因此,人们希望赋予英语完美的理性的和永久的形式:①找出语言规则确定正确用法的标准;②优化、清除缺陷,适时进行完善;③按所期望的形式永久确立下来。在创办“国家学院”的建议一推再推之后,约翰逊编写的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和1760年之后半个世纪早期语法学家们的著作,特别是林德利·默里(*Lindly Murray*)的《英语语法》(1795),满足了当时的需要。科技进步,电影和无线电广播、汽车工业等的发展以及一战的爆发,都对英语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词汇的激增产生了重大影响。英语新词的来源可概括为如下方面:①借入;②自释-复合词(*self-explaining compound*);③拉丁语和希腊语成分组成的复合词;④前缀和后缀;⑤造词;⑥专有名词转化为普通名词;⑦旧词增添新义;⑧新闻影响;⑨意义变化——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蜕变、词义恢复;⑩俚语。

英语演变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词汇“门户大开,来者不拒”,英语借此也成为当今世界语言中词汇最丰富的语言。表2所列一组数字揭示了英语词汇的概貌。

表 2

现在通用词	177 970
外来语词	9 731
废词	52 464
	共计 240 165
复合词	107 555
	总计 347 720

由于英语、拉丁语和法语词汇的融合,现代英语具有三层(语体)意义上的同义词,表 3 所示即为一例。

表 3

英语(通俗 popular)	法语(文学 literary)	拉丁语(学究 learned)
rise	mount	ascend
ask	question	interrogate
time	age	epoch
goodness	virtue	probity

由于英国经济、军事、商贸文化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其在海外的侵略和扩张成了必然,英语也就随之传入了很多地区和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东西非、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加勒比地区、加拿大。全世界总共有近 125 种鄙准语(pidgin)和克里奥尔(creole)语(人数多达 900 万),35 种是以英语为基础的。

在英语语言群系中,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是影响最大也通常被认为是最标准的英语。但从英语的长远前途来看,以后起更大作用的将是美国英语。

一百多年前,歌德就法语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旅行者如果会了这种语言,就可以到处旅行而不需要翻译。”现在这句话可以用于英语了。

三、英语发展之哲学思考和启示

英语在最初只不过是小小的日耳曼部落的口头语,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英语有两次差点儿被消灭,但却凭着其顽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斗志存活了下来,就像一位几经沉浮,在逆境中奋斗不止的勇士一样。这种“卧薪尝胆”、发奋崛起的精神令人敬仰。

英语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词尾变化逐渐消失,从综合性语言逐渐演变为分析性语言。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英语和同属一支的德语,英语易学、易用,越来越“大众化”(popular)的特点就愈加凸显。此外,英语还吸收了世界各地大量语言的词汇。对于征服者的语言(例如法语),英语不但没有排斥,反而将其大量表达融入其中。这种海纳

百川的豁达和包容个性铸就了其今天无可争议的“第一语言”地位。从 18 世纪起,法语被公认为唯一的外交语言,这种特权随着一战结束和《凡尔赛和约》的签署,不得不与英语共享。只要看一下欧洲几十年间主要语言使用人数的变动情况(见表 4),我们就明了英语的这一重大胜利。

表 4

(单位:百万人)

	英语	德语	西班牙语	法语	俄语
1868	60	52	40	45	45
1890	111	75	42	51	75
1900	116	75	44	45	70
1912	150	90	52	47	106
1921	170	87.5	65	45	120.5

从该表可以看出,法语几乎停滞不前,而英语却跃进到 283%。这就像一个人,只有“宰相肚里能撑船”,才能成就大事;又像一座城市,只有吸纳各地精英聚此创业,才会充满活力,永葆青春。

英语世界性的扩张开始于 19 世纪。这是其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英语本身来看,它已经成为一种完整的、成熟的语言,这为其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科技实力及综合国力的提高,抬升了英国及英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加之其在海外的占领和扩张,加速了这一国际性的传播(笔者无意吹捧海外扩张,相反我们坚决反对侵略)。由此不难看出,经济实力及国家强弱对于语言地位的强大冲击力。“落后了就要挨打”,这是我们国家的发展史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必须理顺经济发展的所有相关环节,切实把经济及综合国力提上去。

世界上的语言千姿百态,其变体多种多样。无论是这些语言,还是其方言,都没有优劣和贵贱之分。只要存在,就有其存在的道理。语言的重要功能是便于人们更顺畅地进行交际。某些语言是土语、“混血儿”,或词汇少、结构简单,这些都不能成为被认定是不标准或对其嗤之以鼻的理由。殊不知,它们都是现实、鲜活的语言,都能满足其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的需要;在思想表达需要的情况下,也能通过其自身的机制进行充实和完善(必要时可借用外来词汇)。因此,语言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都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

语言的发展是其内部机制和外部力量不断磋商、协调的动态平衡之发展状态。现代英语几乎没有了曲折词尾,语法结构大大简化,但其发音和拼写之间仍有一定距离,还有大量的习语。由此审视一下我们的母语——汉语,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恰如其分地进行改革(当然是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研究哪些方面改,怎样改,改到什么程度),以使汉语的学习和传播更加容易。同时我们也应该不失时机地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最近读了一篇杂谈,很有见地。大致是说,北京举办 2008 奥运会,北京人及相关部门的人员为了和国际接轨,正在加紧努力学习英语,以便能在 2008 年轻松

地与外国朋友交流。对于办好奥运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而2008奥运会也是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最佳契机,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做好宣传,促成并帮助外国朋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例如,我们可以印发宣传册给外国朋友,上面有汉语和英语并排的常用表达(注意,汉语在先),并配以名胜风景的图片(有汉语和英语翻译)。这不是宣传中国和汉语的绝佳的方法吗?据旅居海外的华侨讲,这种小册子在国外很少、很少,为什么我们总想和国际接轨,而不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展示、宣传自己的母语和文化呢?一个其语言和文化被别人了解甚少的民族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吗?……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1] ALBERT C B, CABLE T.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1993.
- [2] FASOLD R. 社会语言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3] WARDHAUGH R. 社会语言学引论[M]. 3版.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4] 费尔南德·莫塞. 英语简史[M]. 水天同,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5] 李赋宁. 英语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6] 伍铁平. 语言和文化评论集[C].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普遍语法”的哲学渊源和语言观

摘要:对人“心智”的研究,从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中世纪经院学派的语法学家,到近代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都有过相关的论述。在当代,乔姆斯基首创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派发挥了笛卡尔关于“固有结构”的思想以及洪堡特关于“语言能力”的观点,重新提出了研究语言普遍现象的问题。生成语法不局限于对个别语言的研究,而是要揭示个别语法与普遍语法的统一性。换句话说,它不是以具体语言的描写为归宿,而是以具体语言为出发点,探索出语言的普遍规律,最终弄清楚人的认知系统、思维规律和本质属性。

关键词:转换生成语言学 普遍语法 渊源 语言观

一、语言研究的两种观点

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Robins)认为,语言学家对语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语言研究就是为了语言而研究、描写或规范语言,换句话说就是总结、编写出可靠的语法(书);第二种则认为研究语言的意义在于通过确立语法规则而达到深刻的哲学认识,即对人的思维规律、心智结构的阐释以及普遍逻辑的证明。因为这两种观点的论辩、互补和相得益彰,语言学才有了如今的繁荣局面。在我们的语言研究和教学中,第一种观点史料翔实,特色鲜明,为人们所熟知,本文不予赘述。对于第二种观点,从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中世纪经院学派的语法学家,到近代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在当代,持第二种观点的学派无疑是乔姆斯基首创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派。本文拟对转换生成语言学派“普遍语法”的历史渊源和语言观做些探讨。

二、“普遍语法”(语言普遍现象)溯源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说过:“言语是思想、经历的表达,文字是言语的表达。种族不同,言语则不同,文字也不同。但人类的思想反映是一样的,语言的词汇只是这些思想的标记。”斯多噶派(Stoics)(盛行于公元前4世纪)是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他们把语言看做是人的天赋能力,无论语言多么不规则,人们都得照样接受;其语言观可用某位学者的话概括为:“人出生于世,头脑像一张白纸,很适合在上面写字。”这很像后来的“白板说”。

中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学者波依修斯(Boethius)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的普遍现象问题。他认为语义具有普遍性,像“好”、“人”、“道德”等概念具有普遍性,各种语言都有。中世纪语言学的突出成就是经院哲学影响下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